元祐時期蘇轍的諫諍身影與仕途謫遷情志

唐嘉蓮*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摘要

在北宋因元祐黨爭傾軋而造成的元祐士大夫群體謫遷是政治史上的磨難。元祐初年仕途一路騰達，擢升至副宰相之位的蘇轍，在哲宗親政重啓新黨、恢復新法後，遭遇「歲更三黜」的命運，再貶筠州，其後甚至遠徙嶺南。短短十年間，一代文豪蘇轍歷經了大起大落的游宦生涯，悲傷憔悴之情如何得以一澆塊壘？

本文試圖一窺哲宗元祐年間，一代副執宰蘇轍如何於黨爭傾軋中，藉由其所擅長的奏議、表狀札子，縱橫其攸關帝國的政治論述？如何藉由其道統信念，與統治者的對話，展現決然的諫諍身影？又，在君臣遇合的遷謫困境中，如何藉由文學書寫面對一次又一次的謫遷情志？

探究發現，蘇轍困頓的心靈情志中，常懷有北歸中原、保全生命的祈願，即使欲以曠達之語來慰藉身爲逐臣的焦慮心緒，但實寓悲傷的憂怨之語，卻是詩人追逐君臣再遇合的情志觀照。

關鍵字：蘇轍、諫諍 、謫遷、君臣遇合

* E-mail: 103151504@nccu.edu.tw

Su Zhe's Advising and Being relegated in Yuanyou Era

Chia-Lien T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Song Dynasty, Yuanyou Dang-jeng was a political tribulation for scholar-bureaucrats, including Su Zhe, who had accomplished the peak of his political career as a chancellor in Zhezong, Northern Song Dynasty's Yuanyou era. Because of the Yuanyou Dang-jeng, Su Zhe was banished from the court to Yun-jou, and even to Ling-nan. In these short ten years, Su Zhe had experienced the radical change in his political career.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how Su Zhe expressed his political opinions to Zhezong, and how he advised him. In addition, in the dilemma of the prince-minister relationship, how did he face his sense of frustration by writing? After studying, we found even though he was banished from the court to Ling-nan, Su Zhe still expected a good prince-minister relationship.

Keywords: Su Zhe, advise, relegate, prince-minister relationship

* E-mail: 103151504@nccu.edu.tw

壹、前言

謫遷，是一場政治磨難，自屈原(343-278 B.C.)「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史記．屈原列傳)開啓士人行吟澤畔的謫遷悲劇身影後，一代又一代具有崇高品格氣節的士人，不甘僅以文人自居，懷著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在君臣遇合的政治舞台上，執著著以天下爲己任的社會責任，實踐於「雖九死其猶未悔」(楚辭．離騷)的生命信念。即便仕途風雲多變，遭受政敵打擊而身受遷貶，不得已踏上南方瘴癘之境的文化苦旅，如何面對多舛的命運、未知的地域、漂泊的孤獨，始終牽繫著士人的謫遷情志脈動。

在北宋，因元祐黨爭傾軋而造成的元祐士人群體謫遷尤爲政治史上的磨難，而其中蘇軾(1037-1101)、蘇轍(1039-1112)無疑是元祐舊黨最耀眼的星子。相較於東坡在謫遷磨難中所展現大江東去、竹杖芒鞋的曠達情懷，曾於元祐七年(1092)六月被命爲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等同於副宰相的蘇轍，元祐年間仕途一路擢升、平步騰達。據統計，僅元祐元年(1086)二月至九月，蘇轍任右司諫期間，上奏 74 篇奏議[1]，元祐五年(1090)五月至六年(1091)二月任御史中丞，上奏近 50 篇，兩任言官期間所上奏議已佔蘇轍 150 餘篇奏議一半以上(沙紅兵，2007)，宋朝朱弁(1085-1144)《曲洧舊聞》卷七云：「當時台諫論列，多子由上書。」此一時期，蘇轍撰寫了大量的奏議、表狀等公牘文書，平日所喜詩歌辭賦之作卻相對減少，尤其元祐五年(1090)任御史中丞期間，甚至未有任何一首與兄軾之間的唱和詩作(廖志超，1997)。我們可以推測原因之一，可能在於此時期黨爭爲禍正烈，身爲言官爲避免爲敵黨羅織文字獄之罪，因此未有與兄軾的詩歌唱和。而大量的奏議公牘則是最能直接向國君表述個人對政治事務的道統觀與展現諫諍的機會。

然而，元祐八年(1093)宣仁太皇太后逝世後，哲宗(1085-1099)親政重起新黨、恢復新法，蘇轍遭遇「歲更三黜」的困境，歷經出知汝洲，降官知袁州、再貶筠州居住。更於哲宗紹聖四年(1097)責受化州別駕、雷州安置，遠徙嶺南。短短十年間，一代文豪蘇轍歷經了大起大落的游宦生涯，年近花甲二貶筠州，再徙嶺南荒境，仕旅躓踣、身處瘴癘實已不幸，憂讒畏譏、悲傷憔悴之情又如何得以一澆塊壘？

職此，本文試圖一窺哲宗元祐年間，一代副執宰蘇轍如何於元祐黨爭中，藉由其所擅長的奏議、表狀札子，縱橫其攸關帝國的政治論述？如何藉由其道統信念，展開與統治者的對話，展現其決然的諫諍身影？又，在君臣遇合的遷謫困境中，如何藉由文學書寫面對一次又一次的謫遷情志？

貳、相關研究回顧

學界對於蘇轍的研究不似其兄軾備受關注，李冬梅(2002)蒐集整理兩岸學界對蘇轍的生平傳記、文學理論、學術思想、作品研究等面向的研究，發現學界對於蘇轍的研究大體上是圍繞著蘇轍的生平、評價、著述等三個面向，較爲缺乏從北宋理學、經學、思想史等角度來探究蘇轍一生所留下的學術價值。然李冬梅所

[1] 本文所引蘇轍作品繫年，係以孔凡禮(2001)《蘇轍年譜》繫年爲主。

臚列作品中，尚缺乏以北宋元祐時期黨爭爲背景，探討蘇轍在面對新舊黨爭及舊黨之爭的傾軋後，其文學創作上所表現出的謫遷心靈情志。故筆者以蘇轍爲中心，以元祐黨爭及貶謫文學爲範圍，將相關研究簡要回顧。

在研究元祐黨爭方面，范爲之(1999)以蘇轍的政治思維作爲視角，簡略闡述不論是王安石變法中諸多與民爭利的政策，或者元祐更化中司馬光盡去新法的措施，蘇轍的反對意見皆以孟子的「民本」思想作爲維護富民的宗旨。涂美雲(2008)不同於一般探究蘇轍文學創作風格，選擇從政治生涯角度切入，探究身處新舊黨爭及舊黨紛爭間難題的蘇轍有何政治遭遇及政治思維？並分析其具體政治作爲與影響。涂文對於探究蘇轍於元祐年間的政治角色具有參考價值。

沙紅兵(2007)透過對讀蘇轍元祐年間的駢體表狀與散體奏議，來揭示蘇轍面對元祐黨爭的出處行藏與心靈脈動。訾希坤(2007)以熙豐變法、元祐黨爭作爲背景，探究在不同時局中，士大夫互相攻擊、傾軋，蘇轍如何展現積極參政的政治態度以及擔憂禍患上身的矛盾心態。而這種矛盾心理間接影響了他的處世哲學與詩文創作，雜取儒、釋、道三家思想作爲精神養料，歌詠田園、家鄉表現嚮往歸隱情志。可惜處在於此論文缺乏與其兄軾之出處進退比較。上述四篇論文皆將時間背景聚焦在元祐黨爭，或從政治思維，或從表狀詩文類來探究蘇轍仕宦之途與詩文表現。

在貶謫文學方面，廖文華與陳小芒(2005)闡述元豐二年(1079)蘇轍初謫筠州懷有憂讒畏禍的恐懼心境，於紹聖元年(1094)再貶筠州，蘇轍選擇杜門幽居，研修佛理以避世。此外，又淺略勾勒蘇轍兩貶筠州之議論文、記敘文上的風格，可惜在論述脈絡上較顯不連貫。林偉星(2004)選擇蘇轍在哲宗紹聖以後的詩歌做爲分析文本，考察遠離黨爭風暴後，蘇轍透過作品所留下的心境變遷軌跡，其心態由憤恨到悔悟，由封閉到皈依佛道，作者認爲蘇轍至終老也未能從紹聖南遷的困境中走出陰影。

羅春娜(2012)聚焦分析蘇轍被貶龍川期間的創作特點、價值取向以及對龍川文化的影響。嚴宇樂(2012)一文特殊之處在於以蘇氏家族爲觀照點，透過家族文學、貶謫文學、文人心態等研究視角，探究哲宗紹聖、元符間，舊黨人士遭受迫害，蘇氏兄弟謫遷嶺南，蘇過隨侍，三人所表現面對困境與心態調適之道。上述四篇論文主要觀照在蘇轍被貶謫筠州或嶺南後的文學創作，不僅分析作品，亦探究作品背後的心境轉折。

綜述可知，學界已漸關注到蘇轍在北宋元祐年間黨爭中的重要性，但卻缺乏從元祐黨爭中一窺以天下爲己任，力圖展現諫諍職志，一匡北宋治道，卻又未遇明主重用而遭貶謫的蘇轍，在文學作品中表現何等謫遷情志。故筆者試圖從元祐年間黨爭傾軋之際，釐探蘇轍一路從言官被拔擢到副宰相，卻又遭遇歲更三黜的困境。在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中，蘇轍如何藉由諫諍論述展開與統治者的對話？又在謫遷困境中，表述著什麼樣的心靈情志。

參、黨爭與諫諍：蘇轍的言官之路與諫諍身影

尙永亮與錢建狀(2012)指出，就宋代貶謫文化的動因而言，「黨爭」始終是引起大量官員貶謫的最重要原因，從慶歷革新到熙寧變法，從紹興議和到慶元黨禁，每一次宋代政權內部的激烈之爭，都伴隨著大量官員的貶謫。兩宋三百多年，大小黨爭不絕於史，哲宗元祐時期(1086-1094)的黨爭尤其複雜。但對蘇轍而言，哲宗元祐時期卻是其政治生涯的最高峰。

早年蘇轍制科及第，值王安石變法之初，轍反對王安石以嚴令峻法、擾民斂財方式求富國強兵，多次與王安石意見相左，後便自請外任。熙寧九年(1076)任滿回京，將數年間在河南、山東所見新法之害，上書建議廢除青苗、免役、保甲、市易四法(蘇轍集．自齊州回論時事書)，但未獲見採，再度開啓外任幕僚的政治仕途。元豐二年(1079)，蘇軾以「烏台詩案」獲罪，貶爲黃州團練副使，轍亦因此案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內不得調任他職。至元豐八年(1085)神宗駕崩，哲宗幼沖即位，由宣仁太皇太后高氏攝政，同理軍國大事(宋史．神宗本紀三)。宣仁太皇太后攝政，倚重司馬光(1019-1086)與呂公著(1018-1089)等舊黨大臣，並曾詢問二人施政之先，二人皆以「開言路」、「乞備置諫員」爲先務(宋史．呂公著傳)。並藉由二人引薦，許多舊黨大臣紛紛重回朝廷，蘇軾、蘇轍兄弟即在此龐大的舊黨返朝執政之列。司馬光等人抱持「救焚拯溺[2]」的方針，廢罷王安石新法，恢復祖宗舊制，史稱「元祐更化」。同時，舊黨人士亦積極打擊新黨成員，展開了元祐時期的新舊黨爭。

然，舊黨成員之間，由或政治利害、由或政見相歧等差異，逐漸分裂成帶有地域色彩的勢力，甚演變成壁壘分明之洛黨、川(蜀)黨、朔黨等陣營[3]。以蘇軾爲首的蜀黨，和以司馬光爲首的朔黨，及以程頤(1033-1107)爲首的洛黨之間分別有著衝突與矛盾。在與朔黨之間，蘇軾、蘇轍兄弟雖皆由司馬光等引薦回朝，但兄弟二人對於舊黨政見並未完全支持，免役法的存廢問題成了兄弟二人與司馬光之間紛爭的導火線。元祐元年(1086)三月，司馬光決定廢除免役法，恢復差役法，蘇軾認爲新法實施多年，須辨別利害、參用所長，不可一概驟廢。蘇轍則認爲「差役可行，免役可罷」(蘇轍集．論罷免役錢行差役法狀)，與兄之觀點雖不盡相同，但也反對驟廢免役法。免役法之爭，讓蘇軾政途陷入被親司馬光的臺諫官員交相攻訐的困境，而弟弟蘇轍身爲蜀黨成員，自然也身陷舊黨派系鬥爭之中。

此外，與洛黨程頤之爭，卻源自司馬光喪葬事而起。蘇軾曾譏刺調侃主辦司馬溫公喪事的程頤過於拘泥古禮，兩人因而生隙結怨(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93，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條)。程頤原爲一布衣之士，受司馬光、呂公著等人論薦，

---

[2] 司馬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參見《宋史．司馬光傳》，卷 336。

[3] 邵伯溫《邵氏聞見錄》載：「哲宗即位，宣仁后垂簾同聽政，群賢畢集於朝，專以忠厚不擾爲治，和戎偃武，愛民重穀，庶幾嘉祐之風矣。然雖賢者不免以類相從，故當時，有洛黨、川黨、朔黨之語。洛黨者，以程正叔侍講爲領袖，朱光庭、賈易等爲羽翼；川黨者，以蘇子瞻爲領袖，呂陶等爲羽翼；朔黨者，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領袖，羽翼尤眾。諸黨相攻擊不已。」見氏著《邵氏聞見錄》，卷 13。

得以任官朝廷，後被擢至經筵侍講。身爲帝師，雖無行政實權，卻對當時政壇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力，宰相呂公著「凡事有疑，必質於伊川」(二程集．河南程氏外書)。這引起了朝中大臣及二蘇兄弟的不滿，元祐二年(1087)八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1038-1088)曾上奏彈劾程頤：「日跨匹馬，奔馳權利，徧謁貴臣，歷造臺諫……頤乃鼓騰利口，間諜群臣，使之相爭鬬。」(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404，元祐二年八月辛巳條)可見，程頤對於當時政治極具有操弄的野心，這也使得蜀黨與洛黨間的鬥爭愈演愈烈。

對於蘇軾與司馬光、程頤之間的爭論，可以從蘇軾在〈杭州召還乞郡狀〉看這段經歷：

> 始論衙前差、顧利害，與孫永、傅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為仇。臣又素疾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蘇軾文集．杭州召還乞郡狀)

蘇軾指出司馬光不以差役法意見之異而排擠軾，反而是台諫之官妄自猜測司馬光之意而力排軾，以致朔、蜀舊黨不合；蜀、洛兩黨則因私人恩怨而水火不容。可以說，元祐年間除了新舊黨爭之外，舊黨人士間的攻訐亦傾軋不已，蘇轍的仕途隨著政治勢力間的消長而載浮載沉。

上述提及，元祐年間，在司馬光的引薦下，蘇轍也在重返朝廷之列。自元祐元年(1086)二月蘇轍至京，未及國門，即改右司諫；九月，旋改任起居郎；十一月，任中書舍人；元祐二年(1087)十一月，又升任戶部侍郎；元祐四年(1089)六月，改任吏部侍郎，又改翰林學士、知制誥，又兼權吏部尚書；元祐五年(1090)五月，又除爲龍圖閣直學士、御史中丞；元祐六年(1091)二月，再升任中大夫、守尚書右丞，掌參議大政；元祐七年(1092)六月，更升任爲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孔凡禮，2001)。至此，蘇轍的政治生涯攀登至最高峰——副宰執。

元祐年間既然兩任言官——右司諫、御史中丞，太皇太后又廣開言路，直言諍臣的職志自然責無旁貸。正如蘇轍所言：「論奏群臣得失皆是本職。」(蘇轍集．再乞責降蔡京狀)任右司諫期間，共上奏 74 篇奏章，涉及當時許多重大政治議題。其中對於新黨執政人物奸佞之行，蘇轍亦秉持著諫官的職責，不遺餘力地展開彈劾。在〈乞選用執政狀〉中首先乞罷蔡確(1037-1093)、章惇(1035-1105)、韓縝(1019-1097)三姦[4]，云：「左僕射蔡確，憸佞刻深，以獄吏進；右僕射韓縝，識闇性暴，才疏行汙；樞密使章惇，雖有應務之才，而其爲人難以獨任。」(蘇轍集．乞選用執政狀)蔡確是元豐後期新法的主要推行者，也是文字獄的羅織者，立場翻覆毫無羞恥心，元祐二年(1087)蘇轍上〈乞罷左右僕射蔡確韓縝狀〉，不久，蔡確罷爲觀文殿學士，知陳州。而韓縝依然在位，經蘇轍八次上奏要求黜降，並歷數韓縝多方罪狀後，黜知汝洲。

此外，蘇轍是彈劾呂惠卿(1032-1111)之第一人，因呂惠卿「用事於朝，首尾

[4] 元祐元年，左正言朱光庭曾上奏哲宗皇帝，將司馬光、范純仁、韓維譽爲「三賢」，將蔡確、章惇、韓縝斥爲「三姦」。參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68，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條。

十餘年，操執威柄，凶焰所及甚於安石，引用邪黨，布在朝右。」(蘇轍集．乞誅竄呂惠卿狀)三次上表歷數呂惠卿罪狀，並乞誅呂惠卿，其一〈乞誅竄呂惠卿狀〉：

> 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辨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行非度。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心腹。安石山野之人，強狠傲誕，其於吏事冥無所知。惠卿指擿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蘇轍集．乞誅竄呂惠卿狀)

轍知呂惠卿爲人狡詐多端，若不賜死，終必爲患。在蘇轍等人交相彈劾下，其後呂惠卿被貶爲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責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天下傳誦稱快(宋史．呂惠卿傳)。蘇轍接二連三打擊新黨人士，莫不秉守著言官職責，「不敢上負朝廷，下辜公議。是以爲國排姦，有死無二。」(蘇轍集．乞罷右僕射韓縝劄子)

除打擊新黨勢力，程頤、蘇軾之爭所演變成的洛、蜀黨爭，黨同伐異的氣氛瀰漫著整個朝廷，侍御史王覿(1036-1103)上奏言：「蘇軾、程頤向緣小惡，浸結仇怨，於是頤、軾素相親善之人，亦爲之更相詆訐，以求勝勢，若決不兩立者，乃至臺諫官一年之內章疏紛紜，多緣頤、軾之故也。」(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405，元祐二年九月庚申條)又如：元祐六年(1091)八月，侍御史賈易(年份不詳)對蘇氏兄弟喻之爲豺狼，彈劾曰：「豺狼當路，將肆其毒，以害忠良，而啓危亂」、「原軾、轍之心，必欲兄弟專國，盡納蜀人，分據要路，復聚群小，俾害忠良，不亦懷險詖，覆邦家之漸乎！」(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463，元祐六年八月己丑條)面對洛黨激進地詆毀攻擊，蘇軾屢上劄子乞求外任，不願留在權力核心，歷任杭州、揚州、定州等地知州。蘇轍雖也備受抨擊，卻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一路拔升，元祐五年(1090)擢爲龍圖閣直學士、御史中丞，再度任諫官之職。有了更高的實質權位，蘇轍對於洛黨人士的攻訐亦毫不留情的回擊，元祐六年(1091)正月，左朝散郎、集賢殿修撰、知亳州朱光庭爲給事中。御史中丞蘇轍上奏言：「竊見新除給事中朱光庭，智昏才短，心很膽薄，不學無術，妬賢害能。本事程頤，聽頤驅使，方爲諫官，頤之所惡，光庭明爲擊之……今朝廷以私光庭，上則污辱國體，下則傷害善類。伏乞追寢成命，別付閒局，以厭公議。」(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454，元祐六年正月丙戌條)蘇轍上奏認爲朱光庭乃不學無術，妒賢害能之小人，有辱國家，宜取消給事中的任命。

又如元祐五年(1090)，宰相呂大防(1027-1097)和副宰相劉摯(1030-1098)畏懼失勢新黨在外建立黨羽，分布中外，不約而同地建議起用新黨人士，以「調停」舊怨。據〈潁濱遺老傳〉載：

> 自元祐初，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時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微仲與中書侍郎劉莘老二人尤畏之，皆持兩端，為自全計，遂建言欲引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轍

> 於延和殿面論其非，退，復再以劄子論之。(蘇轍集．潁濱遺老傳)

面對正副宰相企圖重啓新黨人士，以調停新舊黨爭之怨憤，蘇轍堅持反對新黨回朝的立場，不僅當朝辯論，更三上「分別邪正」的劄子，認爲君子與小人不可並處於朝廷，其中第二篇〈再論分別邪正劄子〉：

> 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其事，欲以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睎覬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概可料矣。(蘇轍集．再論分別邪正劄子)

其實，蘇轍直言極諫的諍臣形象早於仁宗嘉祐六年(1060)，由仁宗皇帝親策的直言極諫科考試可見端倪。此次制策，二十三歲的蘇轍對於當時邊疆之患與女寵問題提出諫諍之見：

> 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宮中好賜不為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北狄、西戎之奉，陛下又自為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宋史．蘇轍傳)

蘇轍直指國君於朝廷之內歌舞、姬妾荒誕無度的生活，而百姓卻愁苦塗炭之中，再加上北狄、西戎的外患，國家有何太平之日？懷著「必見黜」的心理準備，蘇轍極言國政上的得失。所幸仁宗皇帝深明以直言召入，若以直言棄之，天下人將不信任於皇帝，於是未罷黜蘇轍，而考官將之才第以四等，除商州軍事推官。即使後來元祐入朝，面對黨爭爲禍甚烈的朝政，蘇轍仍秉持著直言無畏的諫諍身影，著實發揮著臺諫言官的影響力。

肆、升遷與謫遷：蘇轍的罷副宰身影與歲更三黜

元祐六年(1091)二月初四，朝廷拔擢蘇轍爲尚書右丞，尚書右丞爲六執政之一，掌參議大政，位在六部尚書之上，相當於副相。自此，蘇轍從御史中丞的諫官身分躐等進入了執政官的行列，意味著由批判到被批判的角色轉變。隨著宣仁太皇太后老病，元祐末期新黨返朝勢力蠢蠢欲動，元祐八年(1093)九月太皇太后崩逝，哲宗親政，元祐九年(1094)改元「紹聖」，復用熙、豐舊臣，有紹述神宗之政之意(宋史．章惇傳)。熙、豐時期的新黨官員一一被召回朝廷，新黨挾怨報復的政治鬥爭亦陸續展開，身任執政官的蘇轍即是捲土重來的新黨首要打擊的對

象。

在元祐九年(1094)二月，新黨李清臣(1032-1102)時任中書侍郎，三月份進士殿試時，李清臣撰作策題，以明確的語氣否定元祐年間的政策：

> 紹聖元年，廷試進士，清臣發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為貴，聖人亦何有必焉。」主意皆絀元祐之政，策士悟其指，於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宋史．李清臣傳)

蘇轍認爲這是爲政策的改變而故意製造輿論，上〈論御試策題劄子〉提出異議，勸哲宗皇帝不要改變元祐之政，指出：「臣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詞，則大事去矣。」又舉例云：

> 至如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于前，而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昔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賦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平准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愷悌之政，後世稱焉。(蘇轍集．論御試策題劄子)

在指陳神宗新法之失時，蘇轍以漢武帝、漢昭帝比擬神宗，本欲論述兒子可以更改先帝舊政不宜之處，卻被一心紹述熙寧的哲宗皇帝指擿竟以漢武帝比先帝，而哲宗自己就如長期受權臣霍光壓抑未能親政的昭帝，這無疑觸怒了哲宗自小長期受到太皇太后抑制而無法親政的痛處，面對蘇轍的劄子，哲宗旋即詔蘇轍除端明殿學士、知汝州。(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 9，紹聖元年三月丁酉條)

而此一劄子讓蘇轍遭遇了「歲更三黜」的命運，據〈分司南京到筠州謝表〉所記：

> 臣前得罪，蒙恩落職知汝州，六月十二日再被告降三官知袁州。即治陸行趨陳留，具舟赴任，九月十日行至江州彭澤縣界，復被告降授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尋拜受前行，於九月二十五日，至筠州居住訖者。愚守一心，漫無趨避；歲更三黜，始悟愆尤。(蘇轍集．分司南京到筠州謝表)

蘇轍於元豐三年(1080)六月，曾因兄蘇軾「烏臺詩案」牽連，貶監筠州鹽酒稅。紹聖元年(1094)，因黨爭失勢，蘇轍由汝州任再貶袁州，三貶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十載還上都，再謫仍此州。廢斥免羈束，登臨散幽憂。」(蘇轍集．雨中遊小雲居)時隔十年再貶筠州，舊時傷痛，復成新憂。前往筠州的水路上，轍之舟船遇到了阻風，作〈阻風〉詩云：

大水蔑洲浦，牽挽無復施。我舟恃長風，風止將安爲。塌然委積水，坐被弱纜維。市井隔峰嶺，食盡行將饑。長嘯呼風伯，厄窮豈不知。蓬蓬起東南，旗尾西北馳。所望乃大謬，開門訊舟師。舟師掉頭笑，沿泝要有時。泝者不少息，沿者長嗟咨。飄風不終日，急雨常相隨。雨止風亦止，條條弄清漪。我言未見信，君行自見之。(蘇轍集．阻風)

詩中寫小舟的前行需要長風相助，若缺乏順風之力，是無法航行。船師告知逆流而上或順流而下，各有適合的時間，飄風、急雨都是一時的現象，只要飄風急雨一停止，在清澈的明湖上，自然可以看見清晰的漣漪。其中「我舟恃長風，風止將安爲」藉用隱喻的手法，將「帝王之力」暗指爲「風」,「新黨小人」猶如「大水」,「轍」則如「舟」,一旦帝王之力不再施展，面對「蔑洲浦」般的新黨勢力，詩人又將如何安身立命呢？雖然如此，對於此去筠州的茫然與困頓，蘇轍仍有著極大的信心，他深信一己之見雖然尚未獲得君王信任，但只要新法實施後，其中的利弊得失，「君行自見之」，有朝一日終能再還朝。據載：「(轍)方赴袁州，過淮南，復遣人往問翁。翁復書二句授之，曰：『十遍轉經，福德立至。』謂所遣人曰：『十，數也。過去十，見在十。』……今予流竄患難，已六年矣，豈十年之間，當有再生之理？即異日北歸，當謁公謝之。」(龍川略志．徐三翁善言人災福)初貶之際，蘇轍始終相信終有返朝之日，相信算命術士之言，無非是希望能更堅定內心的信念。

其實，蘇轍〈論御試策題的劄子〉不僅自己得罪哲宗，蘇軾亦遭牽連。據《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七之七》載：「紹聖元年四月十一日，蘇軾落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降充左承議郎、知英州。」、「已而再有論疏，于是責受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其後又再遠貶海南儋州，兄弟二人的仕途實牽攣於一線兩端。在謫遷路上，蘇軾也在水路遇到阻風的情況，作有〈慈湖夾阻風〉五首：

捍索桅竿立嘯空，篙師酣寢浪花中。故應菅蒯知心腹，弱纜能爭萬里風。
此生歸路愈茫然，無數青山水拍天。猶有小船來賣餅，喜聞墟落在山前。
我行都是退之詩，真有人家水半扉。千頃桑麻在船底，空餘石發掛魚衣。
日輪亭午汗珠融，誰識南訛長養功。暴雨過雲聊一快，未妨明月卻當空。
臥看落月橫千丈，起喚清風得半帆。且並水村欹側過，人間何處不巉巖。
(蘇軾集．慈湖夾阻風)

蘇軾這五首詩運用了詩歌的比興手法，將眼前所見景物，無一不與政壇上的遭遇相隱喻，詩人自喻就有如那「捍索」、「桅竿」、「弱纜」，要在長嘯的萬里風中，爭得立足之地。然而人生當然無法一帆風順，人間處處如巉巖般，旅途歸路只會愈顯「茫然」，我們可以想見詩人此時心中的無助與無奈感。而幸運的是人生的「暴雨」、「暴風」來得急，去得也快，詩人自我寬慰不久的將來會有一輪「明月」當空照。其中一句頗值得玩味，「我行都是退之詩」一方面實指詩人帶著韓愈(768-824)的詩一路相隨南遷，另一方面或許也用諧音雙關暗示著詩人對自己未來仕途的期許是「退之」。在這五首阻風詩中，我們可以窺見蘇軾在仕途上確有過

鴻圖大志，遭遇到小人的打擊、阻撓，即便有著茫然與無奈，蘇軾終能以「臥看落月橫千丈」的曠達心境，「快意」以對。相較於蘇轍期待能再受國君重用的信念，蘇軾對於仕途顯得達觀豁朗多了。

貶謫筠州時期，「脫籍還鄉」的願望常常出現在其詩作之中，從轍與兄蘇軾、侄兒間的唱和詩作可窺一二：

> 荔餉深紅陋櫻棗，桂醅淳白比琳琅。思移嶠北應非晚，未省南遷日月長。(蘇轍集．次韻子瞻連雨江漲)
>
> 道力雖未究，游波偶然伏。糧須三月聚，艾要七年蓄。君恩許北還，從此當退縮。(蘇轍集．次韻侄過江漲)
>
> 北游京洛墮紅塵，箬籠白曬稱最珍。思歸不複為蓴菜，欲及炎風朝露勻。(蘇轍集．奉同子瞻荔支歎)

回首京城仕途之路，彷如墮入塵網之中，遠謫南方筠州以爲只是暫時，應當能早日回到北方。若有朝一日能再北還，詩人期許自己「從此當退縮」，應當要遠離政治風暴，無奈陪伴著詩人的卻是如日月般長久的南遷生活。蘇轍再貶筠州後，寫了不少道教齋醮時專用以向天神祝禱祈福的青詞作品，例如〈青詞．高安〉：

> 寄跡高安，遽逢生日。術者薦告，厄運稍移。仰叩天閽，冀回聖造。(其一)
>
> 今斥逐以來，薦歷寒暑，追惟既往，非有邪慝，憂患已深，理或當復。惟真聖茲閔，與物無私，庶幾北還，近獲成命。非復有心於榮遇，惟覬少獲於安全。(其二)
>
> 望三清而稽首，仰眾聖以馳誠。稍回恩光，照此陷阱。願涉新歲，脫去宿殃。祿命增長，骨肉和合。(其四)

尚永亮(1993)指出對古代士人而言，貶謫意味著一種人格的蹂躪和自由的扼殺，又標誌著一種最沉重的憂患和最高層次的生命體驗。這些士人在被貶謫之前都是最傑出的人才，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道德使命感，治國平天下是他們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且看蘇轍在祝禱詞中，冀望「聖恩再照」、「脫去厄殃」、「有幸北還」、「北歸故鄉」是詩人內心堅定不移的情志與信念，相信聖恩終有再照之日。其強烈的使命感始終縈繞著詩人的心中。

伍、困頓與安頓：蘇轍的南遷困境與北歸焦慮

在日夜盼望北歸詔令的期待中，蘇轍等到的詔令卻是紹聖四年(1097)二月「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制曰：

> 朋奸擅國，責有餘辜。造訕欺天，理不可赦。其加顯黜，以正明刑。降授左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蘇轍，操傾側孽臣之心，挾縱橫策士之計；始與兄軾肆為詆欺，晚同相光協濟險惡；造無根之詞而欺世，聚不逞之黨以蔽朝；謂邪說為讜言，指善政為苛法。……非徒今日知

> 馭眾之威，亦使後世議為臣之義。勉思寬憲，務蓋往愆。可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蘇轍集．蘇潁濱年表)

在新黨刻意強扣「詆欺」、「孽臣」、「險惡」、「邪說」、「蔽朝」等罪名於身，蘇轍又於元符元年(1098)三月再貶「移循州安置」。雷州在今廣東海康，循州在今廣東龍川，已屬嶺南地域，不到一年間，在新黨肆意攻擊、降罪的手段下，蘇轍謫遷嶺南，愈行愈蠻荒。嶺南「天氣卑濕，地氣蒸溽」、「夏秋之交，物無不腐壞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蘇轍集．書海南風土)，是歷來遷客騷人視爲畏途之域，蘇轍亦如此。在〈祭八新婦黃氏文〉道：

> 自筠徙雷，自雷徙循。風波恐懼，蹊遂顛絕。所至言語不通，飲食異和，瘴霧昏翳，醫藥無有。歲行方閏，氣候殊惡。晝熱如湯，夜寒如冰。行道僵僕，居室困瘁。(蘇轍集．祭八新婦黃氏文)

又：

> 予自筠徙雷，自雷徙循，二年之間，水陸幾萬里，老幼百數十指，衣食僅自致也。平生家無尤物，有書數百卷，盡付之他人。既之龍川，雖僧廬道室，法皆不許入。(龍川略志．引)

貶謫不只意味著受貶官員政治地位的下降，與此相伴隨的還有行動、經濟和生存環境的惡化，元祐文人也不例外。而且隨著北宋後期黨爭的愈演愈烈，其因政治地位下降而導致的人生苦難也日趨嚴重(尙永亮、錢建狀，2012)。蘇轍一家歷經風波、恐懼，千里迢遞至龍川，朝廷卻不准其家入住官舍，連僧廬道室之處亦不得安居，生活上的艱困，心境上的挫折當是詩人始料未及。

我們不禁進一步思考的是，這樣的心境情志，詩人又如何觀照？或許寄語上天，祈求上天的庇佑是挫折情志最好的依歸。據羅春娜(2012)統計蘇轍一生作有青詞十一首，其中十首作于第二次被貶謫之後，分別爲江西高安四首、廣東龍川二首、四川臨江一首、河南許昌三首。試看蘇轍謫遷龍川時期，於元符三年正月所作二首青詞：

> 自甲戌之歲，大運在酉，命運相沖。是歲生日之後，自門下侍郎謫守汝州，爾後四經流竄，今在循州。險阻厄窮，何所不歷！疾疢喪禍，近復繼作。雖卯酉逆順，天理難逃，微生不幸，適丁其會。然術推陰命，先凶後吉，自始入運，今已七年。豈始迎其災，而終亡其吉？伏願俯念窮困，稍垂寬宥，覺悟朝廷，解釋羅網，骨肉安樂，相從北還。區區寸誠，願盡於此。(蘇轍集．青詞龍川其一)

又：

> 伏念臣始自甲戌得罪於朝，流竄南方，於今七載，再投嶺表，亦又三年。瘴毒所侵，骨肉凋喪，衣食所迫，囊橐空虛，脾肺冷泄，藥石不效，北歸

無日，老而益窮。常懼寄死南荒，永隔鄉井。因上元之穀旦，依道士之靈科，稽首泥塗，歸命仙聖。一願養心煉氣，日見成功，積陰消散，真陽充滿。二願朝廷覺悟，羅網解脫，振衣北還，躬耕為樂。三願南北眷屬各保安寧，北歸之時，一一相見。(蘇轍集．青詞龍川其二)

從這些祝禱詞中，可以看得出來蘇轍是十分相信命運之說，卜算之士推算蘇轍當「先凶後吉」，但險惡已歷七年，卻未入吉運，詩人不禁對於命運困惑再三。累年貶謫南遷，對於北歸無望、懼死南荒的憂慮是更甚以往。然而，在祝禱之詞中，仍不斷祈求天地神明降幅，使為政者曉悟黨爭中孰是孰非，令詩人得以早日解脫謫遷的羅網，保全生命、北歸中原。一再反覆地陳說，足見詩人心緒的動盪與盼望北歸卻又不得的焦慮感。面對著這樣的焦慮感，詩人只能試圖藉由曠達之語消解心中的憂怨，如：

南海炎涼身已慣，北方毀譽耳誰聞。遙知掛壁瓢無酒，歸舶還將一酌分。(蘇轍集．次韻子瞻夜坐)

海南老兄行尤苦。樵爨長須同一僕。此身所至即所安，莫問歸期兩黃鵠。(蘇轍集．子瞻聞瘦以詩見寄次韻)

南來足憂慮，此病何時瘳。名身孰親疏，慎勿求封侯。(蘇轍集．次韻子瞻謫居三適•夜臥濯足)

獲罪清時世共憎，龍川父老尚相尋。直須便作鄉關看，莫起天涯萬里心。(蘇轍集．閏九月重九與父老小飲四絕)

這些詩句中，「身已慣」、「此身所至即所安」、「莫問歸期」、「勿求封侯」、「直須便作鄉關看」等，看似不以貶謫為意，然而詩人愈是刻意使用曠達之語，心靈深處的不安與憂怨，欲求自我解脫的努力，反而更顯身心無以安頓，怨懟之情難以釋懷。誠如尚永亮與錢建狀(2012)就指出，蘇轍被貶之後，主要表現出兩大心理特點：一是對遣返的希冀、對生命的眷戀；一是頗欲自解卻終不能解、貌似曠達而實寓悲哀。這兩大心理特點在蘇轍身上其實是因循相生而成。

陸、結語

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皇帝駕崩，由其弟徽宗(1082-1135)即位，「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520．元符三年春正月己卯條)，許多元祐黨人又得到牽復的機會，據《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哲宗皇帝》載：「蘇軾、蘇轍、劉安世、秦觀、程頤，移廉、永、衡、英、峽等州。」北赦的佳音傳來，詩人欣喜之情流露無遺，「乘舟北歸，復出山下，而私行無力，仰止勝地，不能自致。」、「邅回瘴癘之鄉，得脫病苦；出入嶺海之際，獲返江湖。天地之恩，草木何報。」(蘇轍集．青詞閣皁)

歷經元祐浮沉的宦海，從右司諫、御史中丞到尚書右丞副執宰，蘇轍始終秉持著天下國家為己任的信念，以其所擅長的奏議、表狀等應用公牘，一方面開展其政治道統的論述，一方面展現積極革除新黨奸佞的諫諍決心。而面對哲宗親

政，重啓新黨人士，遭遇歲更三黜、遠貶嶺南的謫遷困境，蘇轍困頓的心靈情志中，常懷有北歸中原、保全生命的祈願，即使欲以曠達之語來慰藉逐臣的焦慮心緒，但實寓悲傷的憂怨之語，卻是詩人追逐復用的情志觀照。

參考文獻

孔凡禮(2001)。**蘇轍年譜**。北京：學苑出版社。

沙紅兵(2007)。蘇轍元祐時期的駢體表狀──兼論蘇轍同一時期的散體奏議。**廣州體育學院文教資料，15**，84-87。

李冬梅(2002)。蘇轍研究綜述。**許昌師專學報，3**，111-114。

尚永亮(1993)。**元和五大詩人與貶謫文學考論**。台北：文津出版社。

尚永亮、錢建狀(2012)。貶謫文化在北宋的演進及其文學影響──以元祐貶謫文人群體爲論述中心。載於陶文鵬(主編)，**兩宋士大夫文學研究**(64-94 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林偉星(2004)。**蘇轍紹聖以後詩歌的文本分析**(未出版之碩士論文)。福建師範大學，福州市。

范爲之(1999)。試論熙寧元祐期間蘇轍的政治思想。**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51-55。

涂美雲(2008)。蘇轍在元祐黨爭中的角色與影響。**興大中文學報，23**，1-24。

廖文華、陳小芒(2005)。蘇轍兩謫筠州的心態與文風。**江西社會科學學報，10**，97-98。

訾希坤(2007)。**論蘇轍詩文創作與北宋黨爭**(未出版之碩士論文)。陝西師範大學，西安市。

廖志超(1997)。**蘇軾、蘇轍兄弟唱和詩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羅春娜(2012)。**蘇轍被貶龍川期間的文學與思想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暨南大學，廣州市。

嚴宇樂(2012)。**蘇軾、蘇轍、蘇過貶謫嶺南時期心態與作品研究**(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復旦大學，上海市。